




GUIZHOUJINGSHIIGELAZU
ZHUANYONGHANYMINANGUANHUAYANJIU

贵州境内仡佬族 转用汉语西南官话研究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州仡佬族
转用汉语西南官话研究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州境内仡佬族转用汉语西南官话研究 / ~~陈~~ 著

—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6.9

ISBN 978-7-221-13618-3

I. ①贵… II. ①陈… III. ①仡佬语-研究-贵州
IV. ①H2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7507 号

贵州境内仡佬族转用汉语西南官话研究 著

出版发行：贵州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龚 璐

地 址：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 SOHO 公寓 A 座

印 装：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1/32 889mm×1194mm

印 张：10

版 次：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21-13476-9

定 价：2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可与印刷厂联系退换。

致 谢

这项教育部课题能够顺利地完 成,得到了诸多单位和个人的帮助。在这里向他们郑重致谢。

同事雷昌蛟教授平常跟我讨论语言问题最多。这项教育部课题申报也得到了他的启发,否则不会考虑仡佬语与汉语相互影响的可能性。一个是弱势语言,一个是强势语言,单向影响存在,相互影响的可能性不大。经他提醒,感觉这项研究还是值得一试。两种影响力不对称的语言之间,有无影响有多大影响,不做研究不可轻下判断。

省扶贫办各级领导,从省市再到县乡,为寻找调查对象提供了帮助。没有他们高效的办事风格,到大狗场和湾子寨的田野调查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有效开展。老同学兼同事孙建芳教授,还有她的学生邹维政,为我到平正调查提供了帮助。

几位调查对象年龄都在六十岁以上,苟在珍老人今年已 84 岁高龄。他们对调查中的提出的问题均不厌其烦认真对待。平正乡两位老人在调查结束时,还为笔者唱起了仡佬语山歌。仡佬族同姓不通婚的禁忌,是返程后通过电话向大狗场涂应权老先生补充调查的。

还有两个单位需要感谢。一是贵州省图书馆。该馆在 1960 年代所开展的工程浩繁的省内方志复制工作,对我的研究有极大帮助。二是新浪网。新浪微盘和后来重新开放的新浪爱问共享资料,是本研究赖以进行的不可或缺的资料宝库。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贵州省仡佬族	(26)
第一节 仡佬族的族称	(26)
第二节 仡佬族的族源与族属	(28)
第二章 仡佬族人口与分布	(47)
第一节 仡佬族人口	(47)
第二节 仡佬族的分布	(95)
第三章 仡佬语及其语言使用情况	(109)
第一节 仡佬语及其方言	(109)
第二节 仡佬族语言使用情况	(142)
第三节 仡佬族转用汉语的历史及其原因	(166)
第四章 仡佬族分布区周边汉语方言	(189)
第一节 西南官话研究概述	(189)
第二节 各代表点汉语西南官话	(195)

第五章 仡佬语与汉语的接触及相互影响	(214)
第一节 仡佬语与汉语的接触	(214)
第二节 汉语对仡佬语的影响	(222)
第三节 仡佬语对汉语的影响	(233)
附录一 仡佬族调查大纲	(247)
附录二 元明两代贵州境内的土司	(256)
附录三 明代贵州卫所屯军及其迁出地考	(271)
附录四 明代贵州儒学及其影响	(283)
参考文献(300)	
后记	(310)

前 言

仡佬族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古老民族。仡佬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目前,仡佬语已处于濒危状态,多数仡佬族人已转用汉语。开展仡佬族语言转用以及仡佬语与汉语相互影响的研究,是一项有价值的课题。本研究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项目批准号 11YJA740010)。

下面略述研究的意义、内容和方法。

1. 研究意义和价值

仡佬族分布在贵州、云南、四川、广西和湖南等省,其中在贵州境内的仡佬族有 55.90 万人,占仡佬族总人口的 96.49%。使用母语的仡佬族人数不多,据贺嘉善(1983)估计有 6000 多人,绝大多数仡佬族已转用其它语言,主要是汉语。本研究主要关注两个问题:第一,仡佬族转用汉语及其原因;第二,仡佬语与汉语的相互影响。

本研究属于语言接触和语言影响研究。在已有对仡佬语和仡佬族所处地区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仡佬语对仡佬族所转用汉语的影响。在仡佬语研究方面,少数民族语言学界作了比较深入全面的研究,贺嘉善的《仡佬语简志》、张济民的《仡佬语研究》、梁敏的《仡央语群的系属问题》、小坂隆一等的《仡央语言词汇集》、李锦芳和艾杰瑞的《中越红仡佬语比较》等是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贺嘉善等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全面描写了仡佬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划分了仡佬语的方言,探讨了仡佬语的系

属等等。另外,周国炎《仡佬族的语言转用》和《仡佬族母语生态研究》重点分析了仡佬族语言转用的类型及其原因,翁家烈《道真仡佬考察》曾提及仡佬语在道真县的汉语西南官话里留下的痕迹。在仡佬族周边地区汉语方言研究方面,汉语方言学界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黄雪贞的《西南官话的分区(稿)》以及《贵州省志·汉语方言志》、《云南汉语方言志》和《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等是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黄雪贞等的研究,划分了仡佬族周边地区汉语方言的分区,深入探讨了该区域汉语方言的特点等等。以上研究成果,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无论是少数民族语言学界还是汉语方言学界,对仡佬语转用汉语的历史、汉语和仡佬语的接触及相互影响,尤其是仡佬语影响仡佬族所转用汉语的问题,仍未作全面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另外,略感不足的是,无论是仡佬语本体研究还是应用研究,国内学者大都将研究局限在语言范围以内,较少结合历史、民族关系以及移民等方面进行研究。

本研究的意义有四。

其一,全面认识语言相互影响的规律。贵州省汉语通行地区也通行着多种民族语言如苗语、侗语、壮语、布依语和仡佬语等。其间各种语言相互接触,相互影响。强势的汉语固然对仡佬语产生了深刻影响,而弱勢的仡佬语也对汉语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语言接触、语言影响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忽视了这一点。研究仡佬语对仡佬族所转用汉语的影响,可全面地把握语言接触和影响的规律。

其二,深化汉语方言研究。本课题从语言接触和影响的角度,研究仡佬语对仡佬族所转用汉语的影响,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戴庆厦(2003)所说的,“结合少数民族语言能够深化汉语方言的研究,能够开辟一个新角度认识汉语方言的特点,能够验证汉语方言的成果”。

其三,为仡佬族历史尤其是迁徙史研究提供新材料。仡佬族在历史上曾多次迁徙。以仡佬族所转用的汉语方言与周边汉族所说汉语方言的差异为线索,可为仡佬族迁徙史的研究提供语言佐证。

其四,把语言接触研究与民族学、历史学研究结合起来,探索语言转用背后的各种复杂原因。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要素。文化的变化必然影响到语言的使用。把语言转用研究放在历史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来观察,更好地认识语言功能变化以及语言的盛衰兴亡。

2. 相关研究简述

2.1 仡佬族研究

仡佬语是仡佬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研究仡佬语及其使用情况的变化,不能离开对仡佬族历史和文化的关注。与仡佬族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仡佬族的族属,二是仡佬族的历史,三是仡佬族的文化。下面概述学界对仡佬族族属问题的研究。

仡佬族族属问题的研究是现代民族学研究的内容之一,其研究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西方学者所进行的中国及东南亚民族调查和研究。而国内仡佬族研究则肇始于20世纪前期,随着中国民族学的创立而逐渐得到加强。

海峡两岸民族学界对人类学发展进程作过探讨和介绍,回顾并梳理了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历史。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献主要有五篇:林惠祥的《文化人类学》,芮逸夫的《民族学在中国》,陈国钧的《文化人类学》,陈永龄、王晓义的《20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以及王建民的《中国民族学史》。

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Ethnology)是从人类学中分化出来的一门新兴科学。人类学着重研究人的生理和自然方面,所以又可为体质人类学。西方人类学于19世纪趋于成熟,这可以成立于

1839年的法国民族学会,成立于1842年的美国民族学会,成立于1843年的英国民族学会为其标志。而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则主要研究人类文化及其起源和进化。如果以德国学者巴斯典(A. Bastian)发表于1859年的名著《历史上的人类》(Der Mensch in der Geschichte)为学科创设的标志(陈国钧1977),则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学科的历史不过才150年。

西方学者对中国乃至东南亚民族的研究,是与西方殖民过程相关联的。当时的远东地区,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为英属殖民地,印度尼西亚为荷属殖民地,印度支那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为法属殖民地,朝鲜、台湾以及满洲为日本人割占或庇护,而俄国则对远东地区虎视眈眈。中国以及东南亚民族研究,显然与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有关。二战以后,美国成为民族或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镇,对太平洋和东南亚民族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对于20世纪前期西方学者的中国民族研究,《20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一文作了简要回顾。文中说:“东西方的帝国主义国家从19世纪末叶以来,派遣了大批传教士、探险家、学者、外交人员、考察团等,深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也做了一些民族调查,如日本在东北、内蒙古,沙皇俄国在新疆、东北,英、美在西藏、新疆,法国在云南、广西,他们作了不少调查,也写了不少书,有些书过去还曾被视为具有权威性的。俄人研究东北的,在19世纪末叶,有柏拉戴斯、瓦西里夫、赫耶新夫、巴拉士尼达、拉得洛夫等。但对中国民族学界影响较大者莫过于史禄国。史禄国曾任清华大学教授,曾三次探查东部西伯利亚及黑龙江省等地。调查结果,用英文发表三部专著:一为《满洲之社会组织——满族社会组织的研究》(1924年),一为《北通古斯族之社会组织》(1929年),一为《通古斯人的心理思想情结》(1936年)。此外如日本人八木英三郎、滨田耕作、原田枚人、鸟居龙藏等在内蒙古、东北的调查。鸟居龙藏的《人类学及人种学上所见到之东北亚细亚》一书,在当时甚为知名。鸟居龙藏

并于1902年由东京帝国大学派赴贵州调查苗族,由湘入黔滇,测量各地苗族体质,1907年出版了《苗族调查报告》一书。中美合办而由安德鲁斯主持的中亚调查团对蒙古、回等民族的风俗习惯进行了调查,陆续写出了《突厥斯坦重聚》《鞑靼高原》(1930)、《满洲的蒙古人》(1934)、《中国的边疆》(1939),虽多属历史著作,但对民族学研究方面影响很大。1927年—1932年中国和瑞典合办而由斯文赫定领导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曾对新疆、西藏等地进行过有关地理、地质、考古、古生物、语言、民族等方面的调查。此外法国神甫许让曾对甘肃地区的土族做过许多调查,写出过《甘肃西宁土人的婚俗》(1932)。德国人史图博曾任同济大学教授,先后对畲族、苗族、黎族做过调查。美国人陶然士、葛维汉曾任教于华西大学,对四川少数民族曾做过多次调查。至于英国人贝尔、麦克唐纳、美国人柔克义对于西藏的民族调查,英国人斯坦因对于新疆地区的考古和民族调查与戴维斯、杜德和法国人邓明德对于云南的民族调查则为旧中国民族学界所共知。特别是戴维斯的《云南》一书出版后,影响很大。这本书以比较语言学方法,将我国云南民族分为孟克、掸、汉、西藏四系语族,当时曾被认为是第一次对西南民族作出的“科学”分类。(p141—142)

中国民族学是在西方民族学影响下建立起来的。一般以1928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设立民族组为中国民族学创立的标志(王建民1997),而中国民族学会成立于1934年,比西方相应学术组织的出现晚了100年。陈国钧(1977)回顾了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在中国的出现。他说:“中国在科学方面的研究,一向多借助于欧美,人类学及文化人类学也于本世纪之初,乃从西洋输入,至今约有四十多年的发展过程。最早起始于光绪二十九年(即公元1903年),前清政府学制及其学科,在文科大学学科中设有‘人种学及人类学’。同年又有林纾与魏易二氏将德人赫勃朗特 M. Haberlandt 所著 *Volkerkunde* 合译称为《民种学》(北京大学

堂官书局出版),亦有将人类学称人种学者,如蒋智由著《中国人种考》,系光绪三十年初刊于《新民众报》上,后于民十八年由上海华通书局出版为单行本。民国元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学制及其学科内,亦列有人类学及人种学。至于确称为人类学,则始至民国五年有孙学悟著《人类学概论》一文,载于《科学杂志》二卷四期(民五年四月)。然而真正推动我国人类学及文化人类学者当推蔡元培氏,他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游学德国的莱比锡,学习民族学三年,返国出长北大,即增设人类学讲座,由陈映璜氏讲授,著有《人类学》一书,于民国七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一。蔡氏自己曾在民国十年,也在校内讲授美术史,即系以文化人类学方面的理论作为教材,他又在民国十五年十二月发表《说民族学》一文(载《一般杂志》一卷四期)……至此,人类学及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乃逐渐引起中国学术界的注意。总之,蔡元培氏可说是介绍这一门学问至中国的第一人,还加上其他几位先进,使人类学及文化人类学的种子播下土,逐渐生根、萌芽,才会使它好好繁荣滋长起来。”(p12)陈国钧(1977)又把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民国十六年至廿六年;第二阶段——民廿七年至三七年;第三阶段——民卅八年至今。他总结中国民族学学科的特点和不足,说:“从上述四十多年来中国人类学及文化人类学的发展过程看来,主要的特点为研究调查的风气,在任何一个阶段都很盛行,且有相当的成果,其调查对象多集中于全国内地及边区的浅化民族,几乎无一种民族不加以调查。但是也有其主要的缺点,乃各地区的民族文化的调查结果,大多只限于民族志的工作,而缺乏整个有系统的分析及归纳的巨著。”(p16)

陈永龄、王晓义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一文列举了各研究机构和代表人物的情况。文中说:“我们做了一个初步统计,可以约略看出这些民族学代表人物在旧中国学术教育机构中的分布情况和研究范围。”文章共列举了11家研究教育机构,其中有

影响的研究机构和代表人物是：(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代表人物有蔡元培、凌纯声、林惠祥、芮逸夫、戴裔焯等；(2)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云南大学（以功能学派为主），代表人物有吴文藻、费孝通、吴泽霖、林耀华、李安宅、杨堃、江应樑等；(3)中山大学，代表人物有杨成志、黄文山、卫惠林、罗香林等。中国民族学家研究的范围主要为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如苗、瑶、傣、黎、布依、纳西、藏、羌、彝、畲、傈僳、拉祜。这是因为中国民族学创立不久即爆发抗日战争，华北、华东、华南纷纷陷落，而研究机构如中央研究院、中央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不得不向云贵川大撤退，研究人员集中于中国西南民族地区；加以国民政府提倡边政研究，因此民族学者的研究范围多局限于中国西南一隅，研究对象也以中国西南民族为主。正如罗致平（1946）所说：“人类学知识之输入中国，为期较晚。在战前，欧美人类学名著，间有译本问世，而各大学虽设立专科讲授，中央研究院并聘专家主持研究工作，然成绩极微，且多偏重于普通知识之介绍。抗战发生后，沿海各省相继沦陷，人类学者纷纷内迁，从事边疆各族之调查研究，机会较多，而此时政府对于边事亦极注意，故抗战时期，人类学之研究，遂有长足之进展。”（p91）较有影响的民族学调查论著有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934）、《湘西苗族调查报告》（1947）、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1930）等。

关于仡佬族的族属问题，西方学者首先涉足，随后国内学者也进行了初步研究。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情况，芮逸夫《西南民族的语言问题》（1943）、《僚人考》（1967）两文有较为详细的介绍（详下文）。这里只做简要概述。

根据体质、语言、文化和历史，中外学者提出了仡佬族族属的各种假说。观点分歧，莫衷一是。概而言之，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仡佬族为古老而独立的民族，二是认为仡佬族是古老而非独立的民族。前者是德国学者在其《中国史》里提出的看法。至

于后者,各种观点不下十数家。诸家说法虽不统一,而将仡佬族视为与其他民族同出一源则相同。他们论及的民族有苗、僮(泰)、越乃至黎(俚)、瑶、濮、夔等诸种人。甚至有学者将仡佬族视为南亚语系或南岛语系的民族。

2.2 中国西南民族语言研究

仡佬语研究不是孤立地进行的,而是整个中国语言研究的一部分,是与中国乃至东南亚语言系属研究相联系的,跟中国西南民族语言分类密切相关。芮逸夫(1943)简要叙述了在20世纪前期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西南民族语言的研究情况。

芮逸夫(1943)介绍东南亚及中国西南地区语言系属研究的历史,列举了中外学者研究东南亚及其中国西南地区语言系属的10家分类方案。他说:“近数十年来,西人研究东南亚或印度支那的语系已有相当的成绩。其中多与中国西南各族的语言有关,虽不尽可靠,然未尝不可供我们作初步的参考,至少可使我们对于西南民族的语系得到一个初步的认识。”(p1351)这十家的中国语言系属方案是:英国学者伊尔斯《缅甸人口调查报告》(1891年)、戴维斯《云南》(1909)、泰勒《缅甸语言调查初步报告》(1917年)、格黎逊《印度语言调查总论篇》(1927年),法国学者伯叙吕斯基(引自格黎逊《印度语言调查总论篇》)、马伯乐(1929年),德国学者斯密特(1926年),美国学者白鲁菲尔(引自斯密特著作),瑞士学者戴密微《印度支那语言书目》(1925年),中国学者李方桂《中国年鉴》(1937)。

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如下三家。第一家为英国人伊尔斯氏(H. L. Eales)在1891年的《缅甸人口调查报告》(Report on the Census of Burma)内把东南亚的语言分为复调语(polytonic Language)和单调语(Monotonic Language)两大类。复调语分为四个语系:(1)孟、吉(Mon-Khmer)或孟、越(Mon-Annam)语系,(2)泰、掸语系(Taic-Shan),(3)卡伦语系(Karen),(4)藏缅语系(Tibeto-Bur-

man)。(p1352)第八家是中国学人常多征引的英国人戴维斯氏(H. R. Davies)的分类方案,他把川西及云南的语言分属四个语系:(1)孟吉(Mon-Khmer), (2)掸语(Shan), (3)汉语, (4)藏缅(Tibeto-Burman)。第十家是国内学者李方桂在1937年为英文《中国年鉴》作《语言与方言》(L. K. Li: Language and Dialects)一文里提出的语言系属方案,他把中国的语言分属三个语系:(1)印度、支那(Indo-Chinese), (2)南亚(Austro-Asiatic), (3)阿尔泰(Altai)。印度支那语系又分为(1)汉语, (2)泰语(Tai), (3)苗、瑶(Miao-Yao), (4)藏、缅(Tibeto-Burman)四个语族。为便于比较,文中把上述十家的分类列表呈现出来。其中李方桂的分类里泰语系(Tai)分为两个语群:(1)僮语群,包含僮语和黎语, (2)西南泰语群,包含掸语、僕人语和土人语。芮逸夫先生根据上述十家方案而提出了自己的“中国西南民族语系分类拟表”,把中国西南民族语系分为四系:(1)藏缅语系, (2)泰掸语系, (3)苗瑶语系, (4)孟吉语系。

芮逸夫(1943)所引十家语言分类方案中,李方桂先生的中国语言分类为国内学者所宗,后来学者皆谨守其分类框架而未尝稍改。如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1991)一书,全书以汉藏语系四个语族为内容分为四个部分:汉语篇、藏缅语篇、苗瑶语篇和壮侗语篇。李方桂中国语言分类框架也是国内仡佬语归类的基础。

2.3 仡佬语研究概况

虽然仡佬语研究起步于20世纪前期,且由西方学者为主导,但仡佬语真正的调查和研究始于20世纪中后期。从1956年至今五十余年,仡佬语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下面从仡佬语调查、仡佬族语言使用情况、仡佬语方言土语划分、仡佬语的系属等四个方面简述仡佬语调查研究概况。

2.3.1 仡佬语调查

对仡佬语的调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50年代的普查,1970

年代末和 1980 年代初的专题调查以及 21 世纪初的深入调查。

1956 年政府为了解决我国少数民族使用文字问题,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普查。这次少数民族语言普查工作由中国科学院负责,多个部门参与,建立了七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其中第二组负责苗瑶语的调查工作,马学良和王辅世担任领导,仡佬语的调查人员是陈书田、陈其光和贺嘉善等人。1958 年底,他们对贵州省境内仡佬语进行了普查,这标志着仡佬语调查和研究正式启动。根据本次调查,以贵州省普定县窝子寨为代表点,由陈书田和贺嘉善两人共同起草《仡佬语简志》。贺嘉善认为该简志草稿“内容比较简单,没有方言部分。由于种种原因,工作时断时续,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也未写成定稿”。[4] 1963 年,陈书田和贺嘉善两位先生又到贵州复查,记录了贵州省安顺县湾子寨仡佬语。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以贵州省安顺县湾子寨为代表点,贺嘉善先生执笔撰写《仡佬语简志》。该书于 1983 年由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是国内首部仡佬语研究专著,也是本次大规模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的重要成果之一。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 1960 年代中期至 1970 年代中期,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极不正常。与其它所有工作一样,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也被迫陷于停顿。1978 年后社会恢复秩序,民族识别和恢复部分群众民族成分的工作提到了日程上来,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和研究工作又重新启动。由于对木佬人和羿人的认定工作,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组织力量调查了他们的语言。同时,由于发现这两种语言与仡佬语有较亲近的渊源关系,贵州省民研所张济民先生等人对仡佬语进行了专题调查,在黔、桂、滇三省区几十个点上获得了大量的原始语料。本次因民族识别而对仡佬语的专题调查,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远远超过了 1950 年代。在这次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张济民先生在《民族语文》和《贵州民族研究》等刊物发表一系列论文,如《贵州普定仡佬语副词》《仡佬语在民族学

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贵州六枝仡佬语的发语词》《贵州木佬语与仡佬语的关系》《拉基语与仡佬语的关系》《贵州遵义地区仡佬语概述》《贵州木佬语与仡佬语的关系》《遵义县田坝仡佬语的否定副词和发语词》等,其中《贵州木佬语与仡佬语的关系》曾引起了国际汉藏学界高度重视。1993年,张济民先生撰写并出版《仡佬语研究》一书。该书542页44万字,是迄今为止仡佬语研究空前的巨著。语言学家马学良在该书序里誉之为仡佬语研究“全面精深的专著”,认为该书“不论是资料,还是理论的探讨,都是从实际中得来的,真算得上是写在民族大地上的科学论著”(p3)。

进入21世纪,中央民族大学李锦芳先生及其所带研究生,对贵州、广西、云南境内居都、比贡、三冲、月亮湾等地仡佬语进行了深入调查,并与国外学者艾杰瑞合作,将调查范围由国内延伸至境外,在《民族语文》《语言研究》上发表一系列论文,如《比贡仡佬语概况》《中越红仡佬语比较》《红仡佬语概况》和《居都仡佬语量词基本语法特征和句法功能》等,挖掘和抢救了一批包括越南红仡佬语在内的珍贵语料。

经过近60年来对仡佬语的全面调查,以及国内外仡佬语研究专家的深入研究,我们对仡佬语及其方言土语群的分布、仡佬语的结构和特点、仡佬族语言使用情况以及仡佬语的系属等方面,已积累了大量原始语料,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总之,仡佬语调查和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

2.3.2 仡佬族语言使用情况研究

仡佬语分布范围小于仡佬族的分布范围。原因有二。一是经1982年民族识别和恢复民族成分工作后,居住在黔北道真、务川等地的仡佬族“返本归源”,恢复了仡佬族民族成分。据《仡佬语研究》提供的数据,仡佬族人口1978年26000多,1982年53000多,而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已达43万以上,比1982年多出37万人。排除人口自然增长,多出的仡佬族人口是1982年民族识别